

朱德发 阿岩 翟德耀 著

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

朱德发 阿 岩 翟德耀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

朱德发 阿 岩 翟德耀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11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

书号 10099·1700 定价 0.84 元

目 录

茅盾“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	1
茅盾“五卅”前后的无产阶级文学观	41
茅盾与文学上的自然主义	73
茅盾前期的新小说观	112
茅盾前期论现实主义文学批评	145
茅盾与白话运动	164
茅盾前期论文学的社会功利	184
茅盾前期介绍外国文学的特点	206
茅盾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229
茅盾与列夫·托尔斯泰	249
茅盾论文学的“独创”问题	281
茅盾历史小说的创作特色	296
后 记	311

茅盾“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五四时期”，虽然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有所不同，但相似的地方也是不少的，如产生了一批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巨匠就是其一。如果说，鲁迅在五四时期着重从小说创作方面，郭沫若侧重于新诗创作方面，显示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卓越才华的话；那么，茅盾主要从新文学思想的探讨和建设方面，表现了一个文学巨匠的惊人的理论水平。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述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必须置于一定的历史范畴，但是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三十年代初，茅盾在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对“五四时期”的起止时间是这样理解的：“‘五四’这个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该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起算到后二年或三年止。总共是五六年时间。火烧赵家楼只能作为运动发展到实际政治问题，取了直接行动的斗争态度”〔1〕。我们基本同意这种界说，并拟以此历史范畴对茅盾五四时期的文学观予以评述，我们不同意有的研究者把茅盾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延长到“五卅”运动。

“五四时期”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呈现出几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阶段。茅盾作

为五四时代的先进知识青年，并非一开始就拿起笔来为《新青年》撰文或者直接投身于以《新青年》为阵地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之中；他是在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新思潮开启了他心灵的窗户，开始摸索着追求真理，寻找着如何改革社会的答案，并于一九一七年底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上，发表鼓动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论文，号召青年“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惟有这样，“浩浩黄胄，其果有振兴之日”，“暗暗社会，其果有革新之望”〔2〕；而青年学生要成为“社会之中坚”，则必须“翻然觉悟，革心洗肠”，以“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新思想，作为“学术之利器”，“力排有生以来所熏染于脑海中之旧习惯、旧思想”，以“吸收新知新学”，“抱定人定胜天之旨”，发扬“奋斗主义”精神，认清“时势实造英雄”的真理，创造“吾族”文明，做一个“创历史上之新纪元者”〔3〕。可见，茅盾一踏进新文化思想论坛，便显示出一个青年思想启蒙者的特质，他虽然不是“新青年”派的成员，但是他提倡“思想革新”的文化主张和改革社会的政治思想，却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战斗特色，这不仅同《新青年》授予青年以“修身治国之道”的宗旨是一致的，而且与《新青年》同人坚持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欺凌，以争取民众的民族解放的步调是合拍的。尤其可贵的是，他一开始就自觉地把思想文化革命同改革社会、振兴中华、创造文明的政治抱负和爱

国宏愿结合起来，同全球风靡的新文化新思想以及创造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的博大胸怀联系起来，初步显露出他的思想是向着时代的深度和高度发展。

由于他是以先进的思想，启蒙者的姿态，献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从一九二〇年他正式致力于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起，就将文学革命同思想革命以及“再生我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他当时明确地认识到，“现在新思想一日千里，新思想是欲新文艺去替他宣传鼓吹的”〔4〕；倘能坚定地踏上文学革命这条路，那一定能使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发皇滋长，开了花，结了果实”，而这“艺术之花”又定能“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他从衰老回到少壮，从颓丧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里爆出新芽来”〔5〕。并“敢代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做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6〕。基于这种对新文学传播新思想是为着振兴中华民族、为人类将来文明多作贡献的深刻认识，所以他在大量评介外国文学的同时，积极探究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张，致力于新文学思想的创建。如果说，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期，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提出了较系统的新文学主张的话，那么，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期即一九二〇年前后，茅盾便结合新文学发展的具体情状，博采西欧新文艺思潮之长，对文学革命先驱们的文学主张则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并形成了具有自己思想特色的为人生的进化的新文学观。

对于茅盾的新文学观只有放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看，才能比较全面地、深入地理解它的特殊意义：一是五四爱国运动后，“新青年”派的文学理论主张的探讨，除了李

大钊于一九二〇年初在成都的《星期日》上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和鲁迅的一些文学见解尚有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外，其他的主要成员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在文学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甚至胡、周的文学主张还有些倒退，“新潮社”的文学主张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他们大都在白话文学的创建或戏剧改革方面发表了些意见，至于如何从文学思想方面进一步探索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似乎他们并没有做出更新的努力。二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日益扩大，“新青年”派在思想信仰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发展到一九二一年“新青年”团体从组织上解散了，虽然有的成员继承《新青年》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彷徨中前进，但毕竟成了散兵游勇布不成阵；也有的成员离开了新文学战线或者背离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正确方向而向右转；当然尚有些骨干成员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他们已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运动和实际性的革命工作了。茅盾曾回忆说：“‘五四’时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后应当建设怎样一种新的文化呢？这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确定的回答。不是没有人试作回答，而是没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拥护。那时候，参加‘反封建’运动的人们并不是属于同一的社会阶层，因而到了问题是‘将来如何’的时候，意见就很分歧了。然而也不是没有比较最有势力的一种意见，这就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同时这种意识当然也会反映到文艺的领域”〔7〕。正在“新青年”派倡导和发动的新文学运动面临着新的转机新的课题的关头，茅盾却满怀革命豪情，同继续前进的文学革命先驱们取同调，以《学生杂志》、《小说月

报》、《改造》、上海《文学旬刊》等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文艺论文和译介文章，提出了一套更加完整的新文学主张。它是文学革命先驱们文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便为五四文学革命不停顿地向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革命文学”过渡在文学理论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新文学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

—

一九二〇年一月，茅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学论文，正式提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并要求“文学成为社会化”，“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对于五四时期这种为人生的进化的文学观，他在《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一文中表述得更加清楚：“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惟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

如果从思想基础来考察，五四文学革命先驱们的文学主张大都建立在进化的文学观念上。胡适根据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学的进化文学观，提出了白话文一定要取代言言文的文学主张；陈独秀依照“新陈代谢”的进化规律，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周作人本着“从动物进化的人类”〔8〕的理论，提出了“人的文学”观等。虽然茅盾的新文学主张仍

然建立在进化的文学观念上，与先驱们的文学主张一样，具有革命的意义，但是他所说的“进化”更加突出地强调“发展”，强调“革命”，强调“创造”，因之他的文学观含有一定的辩证唯物史观的因素，使其新文学主张带有新的思想特色。

新文学表现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是个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茅盾的新文学观在回答这个问题上，虽然尚未达到阶级论的高度，但它却明确地指出新文学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他所谓的“平民”不能单单理解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应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其中最主要的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的普通的老百姓，尤为可贵的是他提出新文学要表现“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9〕。茅盾当时比较推崇十九世纪“俄国近代文学”，认为它们是“平民的呼吁”，非是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站在“上流人”的立场上来“描写下流社会的苦况”，而俄国文学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虽“出身高贵”却能以“真挚浓厚的感情”来描写下流人的生活，因此看了“他们的著作，如同亲听污泥里人说的话一般，决不信是上流人代说的，其中高尔该是苦出身，所以他的话更悲愤慷慨”〔10〕。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所指的“平民”是与“上流人”相对立的“下流人”，而且也暗示出一个作家要真正反映“下流社会的苦况”、表达下流人的心声，必须解决自身的立场、感情问题。一九二一年他写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将当时发表的“百数十篇”的新创作归为六大类，其中他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说这篇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能以“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揭示出“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

的真正“原因”。这进一步地可以看出，茅盾所认为的“平民”主要指中国当时社会上以广大农民、城市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新文学创作应把他们作为主角，以“阶级观念”来观察表现他们的生活。茅盾所谓的“特殊阶级的人”，即指那些同“平民”处在尖锐对立的阶级地位的“达官显宦，贵族阶级”〔11〕，联系中国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应是那些封建军阀、买办豪绅等统治阶级以及侵袭我国的帝国主义者，这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是新文学批判、鞭挞、否定的对象。茅盾彼时虽然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阶级论者，但他在对待新文学表现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出明显的阶级对立观，至少他能清楚地看到社会上的“平民”与“贵族”是根本对立的两大阶级，新文学应表现并服务于前者而要揭露并否定后者。这种认识，比文学革命倡导期胡适提出新文学的描写领域要扩大到“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小负贩及小店铺”〔12〕，以及周作人提出的“平民文学”的命题，不仅阶级色彩鲜明得多，更重要的是能触及到作家的阶级观念、感情和立场问题。

但是，五四时期的茅盾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思想中的阶级论因素并不居主导地位，因此在新文学表现什么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上，常常流露出普遍的人性观，强调新文学应宣扬“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不仅指出十九世纪俄国的平民文学是“人道主义文学的开端”〔13〕，“人道主义的文学，可称是俄国文学的特色”〔14〕；而且从论述文学与人的关系中回答“我们中华的国民文学为什么至今未确立。我们中华的文学为什么不能发达的和西洋一样”的问题时，其人性观表现得更清楚。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向不知

道文学和人的关系”，总是把“文学当做圣贤的留声机”，当成“文以载道”的工具，从来不懂得“文学属于人（即著作家）的”或“人是属于文学的”，更不明白“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因此从文学的进化轨迹来看，“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所表现的“思想和感情一定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这样的文学“总是人的文学——真的文学”；而“文学家所负荷的使命，就他本国而言，便是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的文学；就世界而言，便是要联合促进世界的文学。在我们中国现在呢，文学家的大责任便是创造并确立中国的国民文学”〔15〕。在他《〈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讲得也比较明确：“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现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文学中占一席之地。”很显然，他是从文学与人的关系上考察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全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乃是创造人的文学，因而“文学家是为人类服务的”，文学作品“是沟通人类感情代全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并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方向上指出五四新文学的“先决的重大责任，就是创造我们的国民文学”〔16〕。这样就把我国新文学的创建同世界文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并从而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兴衰与全人类的文学事业紧密相关的。茅盾这里提出的“人的文学”或“国民文学”，同陈独秀提出的“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在思想基础上基本是一致的，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强调文学表现“人”、描写“国民”、为“全人类服务”，宣泄“全人类的感情”，这是明显地“鼓吹普遍的人性和文学的‘全人类性’”，并不是运用了不“准确的概念”〔17〕。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没

有必要为贤者讳，这正说明茅盾在探索新文学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时，思想比较复杂，既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文艺思潮的冲激，又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前者，这就决定了他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基本上没有出离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轨道。

况且，进化论和人道主义在五四时期反封建斗争中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即使他“鼓吹文学的‘全人类性’”也不能否定其文学观的进步性；尤其茅盾当时已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前半截是很不错的”〔18〕，因而他的进化文学观或人道主义文艺思想愈发具有了战斗的革命的个性。这不仅表现在论述文学“为什么人”上有了一定的阶级倾向性，而且也反映在新文学究竟应表现什么样的生活内容、思想感情和时代精神的探讨上。“新青年”派的文学革命主张，不论是胡适、周作人或者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的建设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见解，尤其李大钊提出的“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和“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的观点更是内涵丰富，发人深思。茅盾正是在先驱们的认识基础上，对新文学的思想内容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阐发，显示出他的进化文学观的深刻性和具体性：

其一，强调新文学表现人生、反映人生，这是五四时期为人生派的共同认识，但是具体表现哪些人的人生，反映哪些人的生活，在认识上并不一致。由于茅盾明确地认识到表现人生的文学主要是为下层社会的广大民众服务的〔19〕，因此他要求新文学应该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当然他也要求“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

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20〕。但是要真正做到真实地反映现实人生并不容易，“有许多近代的艺术家把‘表面的事实’当作‘永久的真实’，他们想表现‘永久的真实’，但其结果只描写了些‘表面的实事’，不知‘永久的真实’是伏在‘表面的实事’之下的，进入于灵魂界或精神界”；而陀思妥也夫斯基则是“用最高意义的所谓写实”，他“描写白痴，描写堕落，不仅是描写这些白痴的表面生活，却把他们的灵魂生活放大了描写出来”〔21〕。茅盾不仅强调要真实地描写人生，甚至要求将写实的笔触伸进人物的灵魂深处，而且强调对“人”作具体分析，然后确定文学反映人生的侧重点。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背景，他指出“现社会中的人，似乎可分为三流：（A）丝毫不曾受着西方文化影响的纯粹中国式的老百姓，是一流；（B）受着西方文化影响，主张勇敢进取的，又是一流；（C）介乎两者之间的，不主张复古而又不主张激烈的新主义的，又是一流”。这是从社会思想及对现实斗争的态度上对社会的人作了分析，新文学则应真实地反映这三部分人的生活。尤其要把“中国式老百姓”的生活和“青年的烦闷，烦闷后的趋向，趋向的先兆”等重大问题，“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而且不仅是表现罢了，应该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使新信仰与新理想重复在他们心中震荡起来”。因此，他“觉得文学的使命是声诉现代人的烦闷，帮助人们摆脱几千年遗传的人类共有的偏心与弱点，使那无形中还受着历史束缚的现代人的感情能够互相沟通，使人与人中间的无形界线渐渐泯灭”〔22〕。这不但说明新文学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普通人生最关注的问题，同时要为患有时代苦闷症的青年指出光明的道路来，使新文学起到改造

人的灵魂、沟通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作用。描写悲苦人生、表现青年烦闷是当时新文学的重要课题；但一般的作者并不能给主人公指出一条正确的前进途径，不论是叶绍钧或者是冰心、郁达夫的小说，大都缺乏“新信仰与新理想”的思想光辉。可见，茅盾这一思想对于引导新文学正确地表现人生、指导人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其二，与上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多次强调“文学是描写人生，犹不能无理想做个骨子”〔23〕，即不但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苦难，以及现实“社会内兵荒”所造成人们生活的不安和悲惨，同时也要表现苦难人们对理想的憧憬，使作品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茅盾在《波兰近代文学泰斗显克微支》一文中指出：显克微支既是新兴的民族文学的领袖，又是世界文学的推进者，他是“有理想有主张地表现人类的生活，喊出人类的吁求”，因此他的作品“不论是描写血肉横飞的战争，暗无天日的官吏乡绅土豪，在凄惨的表面的底下，一定有个面目完全不同的根本思想伏着：——这就是‘爱’，爱人类的‘爱’”〔24〕。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仅亲切活现地描写下等社会的生活的痛苦，而且“常常有个中心的思想环绕，这便是人道主义”，因此，“他书中的环境是现实的环境，他书中的陪衬人物，也都是现实的人；独有书中的主人翁便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是托尔斯泰主观的英雄”。特别“高尔基的文学，革命性极强极烈，又极动人”〔25〕；他对鲁迅反映了“新生活”的朦胧理想的《故乡》也是最佩服的。这说明茅盾非常重视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理想性和革命性，尽管他所说的新理想并非科学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空想色彩，然而当时能够自

觉地提倡表现人道主义理想和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对激励人们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也是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的。尤为可贵的是，那时一般的文学创作重在暴露病态社会的病根和国民的劣根性，就是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也是以暴露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和国民性的弱点为主；但茅盾却强调新文学应表现“国民美的特性”。他说：“俄国国民美的特性，是能忍苦地和黑暗反抗，能用彻底的精神做事，能爱他，能有四海同胞主义的精神。这些国民性经郭克里(Gogoli)以来许多文学家的描写发挥，不但在俄国有了绝大的影响，并且在世界也发生了绝大影响。这样的国民性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文学。”因此他“相信一个民族既有几千年的历史，他的民族性里一定藏着善美的特点；把他发扬光大起来，是该民族不容辞的神圣的职责。中华这么一个民族，其国民性岂遂无一些美点？从前的文学家因为把文学的目的弄错了，所以不曾发挥这些美点，反把弱点发挥了。这些‘国粹文学’内所表见的中华国民性，我们不能承认是真的中华国民性。”〔26〕“把忠厚善良的老百姓都描写成愚呆可厌的蠢物，令人排笑，不令人起同情”，这算不上“真的文学”。〔27〕茅盾强调新文学应表现新的理想、描写国民性美点的见解，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和中华民族达到了一定的本质的认识，从而显示出他的文学观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的崭新特色。

其三，由于他认识到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因此他反复强调新文学应表现时代精神。文学革命先驱的文学主张虽然不同程度地触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大都没有象茅盾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认识得那么深刻，对文学表现时代精神强调得那么

突出。他不止一次地指出：真的文学惟是反映时代的文学，因此“是怨以怒的社会背景产生怨以怒的文学，不是先有了怨以怒的文学然后造成怨以怒的社会背景”，“表明‘怨以怒’的文学正是乱世文学的正宗”〔28〕。这是从文学与时代的内在联系上说明新文学必须受时代制约，反映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精神，而“怨以怒”的反抗情绪则是“新旧思想的冲突”、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异常激烈的“乱世文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的体现。茅盾力倡的为人生文学究竟应反映什么时代精神呢？他曾以进化论的发展观作了说明：

“人群进化的大路到底是无政府主义呢，是社会主义呢，原也难说。不过有一句话可以断定，就是德谟克拉西的思想确是一盏明灯。举凡文学，美术，都欲德谟克拉西化，不能再为一个阶级少数人的私有物。”〔29〕可见，德谟克拉西是平民文学应表现的时代精神，这同陈独秀当时所说的白话文学最有价值的时代精神是德谟克拉西，与李大钊所说的世界绝大的思想潮流是平民主义（即德谟克拉西），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各种对抗强权（包括文学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30〕，在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茅盾还认为“现在德谟克拉西已经放大范围”，它已经和“尼采所深恶的德谟克拉西”有些不同，即注进一些新的思想因素〔31〕。他的这种看法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一文对“德谟克拉西”的解释是基本吻合的。如果具体地加以考察，那茅盾提倡新文学所表现的“德谟克拉西”这种时代精神，在五四时期的现实社会的各方面又呈现出不同的思想特色：他号召青年学生为革新思想应发扬“个性之解放”精神，为建设新制度新文明应发扬创造精